

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淡水渔业的控制与掠夺

孙 瑜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中国东北的淡水渔业历史悠久,至清末民国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侵略和控制中国东北的淡水渔业。在经过充分的渔业调查后,它制定了《渔业取缔法》,建立了哈尔滨水产试验场和吉林永吉水产增殖场,并在“北边振兴计划”中制定水产增殖计划。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的掠夺主要通过水产统制、渔业移民和会社掠夺来实现。这体现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性、残酷性和险恶性。

【关键词】伪满洲国;淡水渔业;水产统制;掠夺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2-0077-10

A Stud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ontrolling about the Freshwater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SUN 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freshwater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is long, the freshwater fishery got a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broke out, Japan began to aggress and control the freshwater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Japan researched the freshwater fishery into details, and made a law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freshwater fishery. Japan built the fisheries experimental station in Harbin and the fisheries proliferating station in Yongji of Jilin. At the same time, Japan made a plan about the fisheries proliferation in the Plan of the Northern Prolif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Japan came true the freshwater fishery in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controlling the fishery, immigrant and plunder of corporations, and it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ruthless and malignant of aggression of Japanese against China.

Key words: the Puppet Manchukuo; freshwater fishery; controlling the fishery; predatory

中国东北水产资源丰富,近代以来引起日本的觊觎。一般说来,水产业分为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本文将主要着眼于前者,至于近代以来日本对后者的掠夺将另文论述。目前国内关于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集中于工业、林业、农业、畜产业、矿业等领域,对于日本对东北淡

【收稿日期】2017-1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伪满时期东北工业体系殖民地化研究”(14BZS043);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吉林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中若干重大侵华罪行研究”(14JZDW006)

【作者简介】孙瑜(1978-),男,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日关系史、东北地方史研究。

水渔业的掠夺涉及较少^①,且多是一些概述性的成果,缺乏专题性研究,因此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事实上,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资源的掠夺是日本掠夺东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对华掠夺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小觑。故笔者尝试对此问题作一粗浅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清末民国时期东北淡水渔业的发展

东北的渔业起源很早,“松花江流域自然鱼的捕捞历史悠久,远在 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牡丹江、松花江干流沿岸的肃慎、扶余、东胡等少数民族部落的先民们就开始使用石制、骨制的鱼鳔、鱼叉、鱼钩等原始的工具捕鱼。”^②至渤海国时期,东北的渔业已经非常发达。“在向唐朝进献的鱼类贡品中,还有鲮鱼、乾文鱼等。”^③“据典籍记载,至契丹(辽)隆盛时代,国王每年在松花江畔举行头鱼宴。所谓头鱼宴是指在结冰期凿冰而得大鱼的活动,并得到国王的参加,结束后再举行盛宴。”^④足见当时的捕鱼场面是很盛大的。“清代作为吉林名产的白鱼,每年都向北京朝贡,颇为有名。”^⑤因为是贡品,它受到皇家和官府的保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东北淡水渔业的地位和重要性。至清末,东北的淡水渔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北的淡水渔业资源主要集中于吉黑两省。据 1905 年的调查,兴凯湖中国一侧的居民多半从事渔业,每年可向俄境输出盐渍的鱼 2 万斤,从哈尔滨到依兰有专业捕鱼者七八十个窝堡(每窝堡有 50 至 100 人),每年向哈尔滨等地输送鲤鱼两三万元,胖头鱼两万元,大白鱼一万余元,怀子鱼一万余元,鲑鱼六七千元,黄鱼三千余元。从依兰到哈拉苏苏之间有专业捕鱼者 150~160 户^⑥。1908 年,图们江流域鱼产分为两种,一曰清蒙,一曰打马哈(即大马哈鱼,笔者注),以珲春一带所产为最盛,每岁青蒙约可取二三十万斤,打马哈可取七八十万斤。珲春旗民多业鱼,每人年可获百二三十元^⑦。黑龙江亦盛产鱼类,爱辉附近即有专门捕鱼的窝堡八九处,每窝堡有十二三人,每窝堡年捕鱼可达三千斤^⑧。据 1908 年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各地共有专业渔户 494 户,渔船 171 只,年产鱼 1862154 斤^⑨。由以上可知,清末时期东北的淡水渔业产量较高,颇为繁盛。

这一时期,吉黑两省还出现了一些渔业公司。1907 年,由锦州府商人赵文广等在哈尔滨创设松嫩两江渔业有限公司,捕鱼水域在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东至黑沙坨子、西至运粮泡、南至王家站、北至多耐站,面积四百里,已积股 5 万 1 千两^⑩。1908 年,又有吉林商人孙德升、郭兴云等禀请设立松江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招股本银 20 万两,由发起人预垫银 5 万两,请拨公款 5 万两作为官股,其余十几万两俟开办后陆续招齐,承办吉林省松花江及其支流的渔业^⑪。1910 年,商人荣贵禀请在庐滨府创办

① 主要成果有:范立君:《近代松花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前者论述了近代松花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及其开发,后者论述伪满时期日伪对东北水产业的控制与统制。

②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编:《松花江志》第 4 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03 页。

③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 2 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年,第 198 页。

④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哈爾濱事務所编:《北滿洲概観》,满洲文化協會發行,昭和 8 年,第 188 页。

⑤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哈爾濱事務所编:《北滿洲概観》,第 189 页。

⑥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30 页。

⑦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330 页。

⑧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332 页。

⑨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第 332 页。

⑩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 332 页。

⑪ 孔经纬主编:《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 332-333 页。

满洲里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已集股两千元,拟再续招一万元,专捕呼伦池之鱼,已获知府同意开办^①。上述公司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表明东北地区渔业经营的商品化和近代化趋势已日益明显。

民国建立以后,东北的淡水渔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1913年的记载,辽河沿岸的辽源、铁岭等处,年产鱼800万斤左右;鸭绿江流域的安东县,年产鱼、虾、蟹六七十万斤;辉发河流域的磐石、桦甸两县,年产鱼1.2万余斤;浑江流域的通化、怀仁两县,年产鱼13万斤左右;牡丹江流域的依兰产鱼22万斤,绥芬产鱼20万斤左右;嘎呀河流域的延吉约产鱼四五十万斤;呼兰河流域的呼兰府年产鱼50万斤;呼伦河流域的呼伦厅产鱼40万斤左右;黑龙江沿江产鱼无穷,我国夙乏鱼轮(应为渔轮,笔者注),仅瑗珲厅捕鱼,年八九十万斤耳^②。另据资料显示,洮南县境内的洮儿河两岸1913年有渔户50余家,鱼产以鲤、鲫、鲇、黑、狗等类最多,年产量约200余万斤;札赉特旗的月亮泡,亦为鱼产最多之处。饶河县境内的挠力河1913年产白鱼1万斤,鲤鱼2万斤,鲫鱼4万斤,鲢鱼1万斤,菊花鱼1万斤,鳊鱼2万斤,勾心鱼6万斤;乌苏里江产大马哈鱼5万斤^③。松花江下游鱼产更丰富,通河县年产鱼24万斤,同江县年产鱼50万斤。嫩江是东北鱼产最丰富的河流,据民初调查,嫩江流域的龙江县产鱼200万斤,大赉县1436361斤,肇州县1809760斤,肇东县230776斤^④。显然,这和清末相比渔获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至伪满建立前,东北的淡水渔业已渐趋繁荣。根据“满铁”的统计,1928年“南满”河流的渔获量为326840贯,“北满”河流湖泊的渔获量为4752000贯^⑤。另外,“以南满的主要河流捕获鱼种来看,鸭绿江1930年前后捕获量为约60万贯,辽河捕获量为65万贯,225000条。主要捕获鱼种鸭绿江有白鱼、鳊鱼、虾、鲤鱼、鲢鱼等,辽河是面条鱼、大头(包)鱼、滑子鱼、胖头鱼等。”^⑥1931年东北淡水鱼产量为18050公吨^⑦。另据吉林农矿厅的调查显示,1929年吉林省扶余县、额穆县、桦川县、宁安县、滨江县、依兰县、虎林县、饶河县、吉林县、方正县、珲春县、宾县、桦甸县共13个县有渔船360只,渔民2678人^⑧。

民国时期东北淡水渔业的繁荣主要由于以下几点原因:1.东北人口的急剧增加,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大幅提高。据《东北年鉴》的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三省(不包括热河)有人口300万人,民国七年(1918)东北(包括热河)总计有人口2835.7万人,其中东北三省有人口2003.9万人,民国十七年(1928)东北(包括热河)为2977.9万人,其中东北三省有人口2526.4万人^⑨。另据资料记载,1908年东三省有人口1715.6万人,1918年为2156.9万人,1928年为2803.4万人,1930年为2957.5万人^⑩。各方的统计数据虽然不同,甚至相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国建立以后东北人口急剧增加。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农民历来有“闯关东”以躲避天灾人祸的传统,适逢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水灾不断,战乱频仍,从而导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量,对作为东北居民粮食副食品之一的水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了,这扩大了东北地区水产品的销售市场,从而相应地促进了渔获量的增加。2.渔业公司的建立,近代化经营模式的开展,提高了渔获量。民国时期东

①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第333页。

②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434页。

③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434页。

④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434页。

⑤ [日]满铁调查课:《改订满蒙要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5年,第159—160页。

⑥ [日]满史会编:《满州开发四十年史》上卷,满州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1964年,第828页。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中国文化服务社沈阳印刷厂,1948年,第9页。

⑧ 德惠刘爽著:《吉林新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449—450页。

⑨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1931年,第149页。

⑩ [日]满史会编:《满州开发四十年史》上卷,第93页。

北的渔业公司数量更多,规模更大。1914年同江县商人史玉年等集股资本数千元,集合当地渔民,于该处征收局承领街津口、哈鱼河、加吉河三处鱼票,购器试办,获利颇丰。渔民分利,较自捕加倍,俱各称便^①。1919年4月,哈尔滨四家子北堤外渔户集股设立渔业公司,专营哈埠一带渔业^②。1926年吉林商人杨庆余、赵福寿、吴志云等三人集股5万元,在吉林省城设立日升渔业有限公司。年出大小鱼共15万斤,得价2.25万元^③。此外,1926年宾县农会会员耿连成等筹设渔业公司,1928年哈尔滨商人李梦白、丁敬久、蔡双兴等人组织滨扶渔业有限公司等。这些渔业公司和过去的散渔户相比,人员数量增加,资金更为雄厚,渔具比较先进,捕鱼技术也获得提高,因而渔获量有了明显的增加。3.铁路的修建,交通的便利,促进了水产品销往各地,扩大了东北水产品的销售市场。1898年,俄国开始修建东清铁路(中东铁路),至1903年7月开始全线通车,此为东北铁路之滥觞。此后,为了进一步掠夺东北资源甚至控制中国东北,俄国、日本、英国等国纷纷在东北修建铁路,而奉系军阀为了谋求自保也修建了部分铁路。从1898年至1931年9月累计在东北修建铁路长达6226公里^④。铁路的修建,便利了东北的交通条件,有利于商品运输和东北市场的扩大。东北淡水鱼的交易主要在冬季11月份以后进行,夏季气温高向远处输送几无可能,只是补充渔场附近的需要^⑤。在冬季,通过铁路将捕获的淡水鱼输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则异常方便,这扩大了淡水渔业产品的销路,有利于东北淡水渔业的繁荣。

二、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的控制与经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占整个东北,此后日本开始关注并积极控制东北的淡水渔业。事变前,“满铁”虽然对东北渔业进行了部分调查,但不够详细。此后由于掠夺东北渔业资源以及制定渔业政策之需要,在伪满实业部下设临时产业调查局并进行了相关调查。作为夏季渔业调查,完成了对嫩江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及松花江流域的渔业生态调查,在“康德三年”(1936)还对依兰与抚远间,乌苏里江下游,黑龙江一部分作了初步调查,以及对哈尔滨附近流域和哈尔滨与新京间水产物供需状况作了调查。作为冬季渔业调查,对于冬季结冰期间该行业的渔具、渔法、鱼族种类、渔获物的处理以及渔业权利的内容等进行了实态调查,在“康德二年”(1935)至“康德三年”(1936)间还对嫩江流域、江桥附近以及绰尔哈河流域梁子(一种渔具)的使用情况作了调查^⑥。调查之详细与全面为东北历史上所未有。与此同时,“满铁”经济调查会也对东北的河流状况和渔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些为日本后来制定相关吞并和掠夺计划作了充分准备。

1937年5月,伪满解散了临时产业调查局,该局水产班和农牧科合并,作为伪实业部农务司的水产科。此后,该水产科又先后隶属于伪产业部和伪兴农部,担负其制定伪满水产政策的任务。1937年7月,伪满政府出台了《渔业取缔法》。“该法对于主要渔业许可制度,禁止有害之捕捞方法,保护水质,保护淡水鱼族之回游,并统制水产物之交易。”^⑦同时该法规定:“无不须许可之渔业,亦即任何渔业,一律须经许可,且取得许可之业者,仅容许其自由经营该种渔业,而无其他任何特权。”^⑧显然这将东

①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434页。

②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435页。

③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第510页。

④ [日]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第357页。

⑤ [日]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事情(上)》,满洲事情案内所发行,昭和9年,第85页。

⑥ [日]實業部總務司文書科編:《满洲国産業概観》,满洲行政學會印刷,1936年,第45页。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7页。

⑧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7页。

北的渔业捕捞权控制在伪满政府的手中,有利于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的统制。另外该法还提到:“对于达麻哈鱼(大马哈鱼,笔者注)、鲟鳇、贝类、海参、甲鱼等类之捕获,更特加注意,因是等水产资源,易于枯竭故也。”^①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水产品的珍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已经注意到此点,并将其作为统制和掠夺的重点目标。《渔业取缔法》是东北第一个正式的渔业法规,它以统制东北渔业以服务于日本掠夺为目的,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东北渔业活动的规范。尽管如此,该法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影响极为有限。“法规虽已确立,而实施此法规之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尚未整备,渔业警察更未彻底实行,以致用炸药捕鱼者有之,擅行捕获有限制之鱼类有之;同时警察人员之渔业知识不足,加以人数过少,无法彻底取缔。”^②另外,东北渔业向来缺乏足够约束,此法初定,渔民对它的遵守也必然有限,这也影响到实际效果。

这一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水产业不甚重视,因此在这期间实施的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主要制定了有关工矿业的生产计划,同时也涉及到农畜部门,但并未有关于水产业的生产计划。尽管如此,在1939年推行的“北边振兴计划”中却开始关注到水产业。原因之一是在所谓的“北满”,淡水渔业比较发达。该计划规定:农畜水产是以现地生产为目标,树立积极的增产方策^③。可见,这里把水产的增产作为“北满”水产事业的重点。其“增产之主要目的地,为伪三江省、东安省、牡丹江省、北安省、黑河省、兴安北省。”^④按此计划,以大马哈鱼为例,抚远县、饶河县、虎林县和“黑河省”增产目标如下:1938年为390吨,1939年为555吨,1940年为705吨,1941年为880吨^⑤。可见,按此计划1941年是1938年产量的2.26倍。另外,据此计划从第一年的实施成绩来看,“在水产方面,伴随着渔业补助金的发放,渔场的开发与增加,养殖场的设立,放苗养殖的实施,又新设和扩充了合作社,进而谋求生产资金的融通,生产资材配给的方便化,共同设施的配置与利用,水产加工品的增产。水产的增值目标约为两万五千吨。”^⑥事实上,整个“北边振兴计划”以虎头蛇尾告终。从渔获量指数来看,以1939年产量为100,1940年为114,1941年为80,1942年为90,1943年为94,1944年为134^⑦。可见这远低于其预期目标。尤其是1941年至1943年产量不升反降。事实上,水产本就作为该计划的次要组成部分,获得的资金匹配极为有限,在整个计划未达到设计目标的情况下,它的实施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实现水产增殖,日本加强了对东北水产的试验研究。1939年在哈尔滨建立了哈尔滨水产试验场,开始对松花江、嫩江等黑龙江水系的淡水鱼进行试验和调查。“对于从日本内地急剧增加的日本人提供可食用的淡水鱼,这也是一个研究课题。”^⑧这里服务于日本人的目的性非常强。该机构创立时间较短,缺乏足够的经费与器材,设备也不够完善,加之技术人员亦不足,因此收效甚微,未对东北的水产业产生大的影响。而在“关东州”,“昭和16年从长野县南佐久郡引入成年鲤鱼400尾,鱼苗2万尾,昭和17年继续引进成年鲤鱼200尾”^⑨。这一方面是对日本物种在东北普及进行的试验,暗含日本要长期经营和占有东北的意图,另一方面,此种鲤鱼符合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完全是为在华日本人食

①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8页。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39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273页。

④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42页。

⑤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60—61页。

⑥ [日]满洲国通信社:《满洲国现势》康德8年版,满洲国通信社发行,第293页。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62页。

⑧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论)》,满蒙同胞援护会,昭和46年,第779页。

⑨ [日]永井和歌丸:《关东州の資源と工業(海産編)》,关东州工业会发行,昭和20年,83—84页。

用所准备。此外,1939年还建立了吉林永吉水产增殖场,在繁殖放养东北原有鲑鱼的同时,还企图从日本、朝鲜移植虹鳟、姬鳟、西太公鱼、鲑鱼等,并在镜泊湖已经投放了两千万粒西太公鱼鱼卵,还计划将来在整个东北地区进行投放饲养^①。显然,这也是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化的一种表现。

伪满后期日本对东北水产业的重视有所提升。1940年伪满设立兴农合作社,将水产置于其管辖之下。在行政上,则将其置于兴农部农政司合作社的监督之下。“及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势力圈内之食粮资源,痛感不足,因而水产部门,在确保食粮资源之要求下,应运而生;该社(兴农合作社,笔者注)遂充实其水产部门之机构,积极从事水产物之紧急增产及‘出荷’、配给、统制等工作。”^②可见,粮食的短缺迫使日本不得不将水产品作为补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基本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在1942年9月,伪满政府制定了《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其中指出:水产业确立自给自足的目标,特别是对国内淡水渔业的发展倾注主要精力^③。为了掠夺尽可能多的水产资源,日伪当局加强了对东北水产业的统制,此点将在后文中详述。伪满时期东北淡水鱼渔获量大致如下:1934年各水系产量如下,呼伦湖水系4500吨,松花江干流4200吨,牡丹江水系500吨,第二松花江水系1500吨,嫩江水系6000吨,乌苏里江水系2000吨,辽河水系1000吨,鸭绿江水系2000吨,额尔古纳黑龙江2000吨,合计23700吨^④。从东北地区淡水鱼捕获量来看,1937年为26276吨,价值360.1万元;1940年为53733吨,价值1794.9万元;1942年为37472吨,价值2248万元^⑤。另外,1942年各省淡水鱼捕获量详见下表1^⑥。可见,淡水鱼的捕获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地区。另据资料显示,1939年淡水鱼的捕获量达到6万吨的记录^⑦。由以上可知,伪满时期东北的渔获量增加不少,这反映了当时需求量的增加,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由于粮食不足而加紧对东北水产品的统制和掠夺,因此这一时期东北的淡水渔业也被迫进入到一个明显的膨胀期。

表 1 1942 年各省淡水鱼捕获量比较

	数量(公吨)	金额(千元)
合 计	32081	18468
辽东省	942	1888
辽西省	438	393
吉林省	5987	2972
松江省	10597	7195
黑龙江省	14117	6020
原兴安省	5391	4012

① [日]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水产概要》,满洲事情案内所发行,1940年,第42页。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40页。

③ [日]《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C12120039300,所蔵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日]《分割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8060363500,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编:《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年)》,1949年,(7)-1。

⑥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编:《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1931—1945年)》,(7)-2。

⑦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各論)》,第783页。

三、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的掠夺

东北淡水渔业属于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和产业的次要方面,从程度和数量上都远逊于农业和工矿业,但掠夺的性质依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水产统制

1934年3月30日,日本内阁出台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纲要》,对钢铁业、轻金属工业、石油业等工业进行了严格的统制,但对于水产业规定:“顺应我国的水产政策,努力保护增加满洲水产资源,以期长远利用。为此,满洲国不奖励轮船拖网渔业和机船拖网渔业。”^①可见,伪满建立之初日本对东北的水产业并未实行统制政策。在此后1937年5月伪满政府公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中也未涉及水产业。至1938年末,伪满政府制定了《生活必需品配给纲要》,次年2月以资本金1千万元建立了准特殊会社“满洲生活必需品配给会社”^②。此后伪满政府对其进行了改组,至同年12月建立了拥有资本金1500万元的“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该社建立后,水产物被列为其统制之下。“‘生活必需品会社’首先统合业已开市之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牡丹江等五中央批发市场,及已取得许可之佳木斯、锦州、安东三市场,由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开始经营;继于民国三十年五月,复又统合鞍山、抚顺、四平、图们、营口等五市场,以‘生活必需品会社’市场分号之资格,由七月一日起始营业。如是,形成生鲜食品之一元的统制化,采抵物价政策,调节品质与数量,完成统制工作。”^③可见,“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建立后,水产业逐渐进入到全面统制时期。

1944年1月,伪满政府公布《水产统制令》,其中规定:“凡经指定之水产物在指定地域内,除水产物交易场及‘渔业取缔法’第十三条所指定之场所外,生产者不得擅自出让;又非指定之交易者或受委托者不得接受;指定之交易者须按照配给计划,从事配给”^④。按照此统制令,所有的水产物生鲜商品均在其统制范围之内,而盐腌品、干制品和醃酱品中的大部分属于统制之列,总体上东北的水产品处于统制范围内的达到90%。统制的手段采用摊派与分配制。“在配给方面,都市中每人每年十二公斤,偏僻地方,每人每年九公斤,以此估计各省所需配给量。”^⑤按照东北民众的饮食习惯,水产品是重要的副食品,尤其是沿海沿江地区更是有食水产品的习惯。而每人每年仅供给十二公斤,一方面破坏了东北民众的饮食结构,另一方面也剥夺了民众的基本权利。不仅如此,在配给对象上,又分为军需、特需和民需。显然军需、特需优先,民需只有在满足前两者的前提下才能供给。这样配给给普通民众的水产品就更少了。此时承担水产物统制的机关为“满洲水产物统制组合”。但此时处于战争末期,经济形势恶化,物资紧缺,该组合统制效果微弱。故伪满政府又重新设立水产物统制机关,将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分开统制。其中海洋渔业方面设立“南满洲海洋渔业株式会社”,淡水渔业方面设立“满洲水产株式会社”,规定由1945年4月1日起开始办理业务。“满洲水产株式会社”建立后不久东北即得解放,其业务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

显然此种水产统制对东北淡水渔业的掠夺是非常明显的。曾任伪东安省次长的歧部与平战后供认:其在任时,奖励渔民在乌苏江(应为乌苏里江,笔者注)上打鱼,并配给捕鱼工具。但是,捕上来的鱼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2页。

② [日]满洲国通信社编:《满洲国现势》(康德10年版),满洲国通信社,第545页。

③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180-181页。

④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181页。

⑤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182页。

全部由政府以统制价格收买。当时在饶河收买了 3 万尾,虎林收买了 1 万尾,都是大鱼。三年时间共收买了 12 万尾^①。在此这些鱼都被政府低价收购,严重损害了渔民的利益。再以东北的鱼米之乡肇源为例,当时日本主要通过当地的水产合作社进行统制。“从水产合作社成立时起,肇源鱼类便不许自由买卖,鱼类交易,必须通过水产合作社‘叫行’,卖给指定的‘仲买人’,这就剥夺了渔民自由销售的权利,更由于仲买人与管交易的人员互相勾结,压等压价,得不到公平买卖,致使渔民在经济上遭克扣,蒙受不应有的损失。”^②而且渔民从事捕鱼业还需持有水产合作社颁发的许可证。“渔民为了领到许可证,不得不向主管人行贿送礼。私打鱼被没收渔具的情况时有发生,广大贫苦渔民失去捕鱼自由”^③。此外,“水产合作社对帆布、网线、油类等渔业生产资料实行配给,主管人从中营私舞弊更为严重,渔民虽遭受层层盘剥,竟敢怒而不敢言。”^④事实上,不仅肇源如此,该现象在整个东北的淡水渔业中普遍存在。由以上可见,这种水产统制严重损害了广大东北渔民的利益,使他们遭受到层层压榨,生活陷于困苦。

(二)渔业移民

日本为了完全占有中国东北,曾先后多次向东北进行移民。仅在 1936 年以前,日本就对中国东北共进行了 5 次武装移民,共计移民七千余人。此后,在 1936 年 5 月 9 日,日“满”两国政府又共同出台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确定了在 20 年间移民 100 万户 500 万人的庞大计划。而鲜为人知的是,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渔业资源,日本还专门进行了所谓“渔业开拓民”的移民活动。早在 1933 年夏,日本间谍后曾任日本内阁参议的大谷光瑞就派出技师到松花江等地进行详细调查。他提出专门针对中国东北的渔业侵略计划。按此计划,“拟在五月(1934 年 5 月,笔者注)中旬先移渔民五百户,人口约一千五百余。其划定渔业地区,以松花江、同江、黑龙江附近为中心。其首先移去之渔民,散住于松花江下游一带,在同江富锦附近。并拟使用机器捕取大量江鱼,贩行全满。”^⑤此外该计划还准备建立“江鱼罐头公司”,通过制作罐头并向世界市场贩卖而获利。此时,在东北日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活动,显然此次渔业移民计划的提出也是对上述活动的一种回应和支持。对于此次移民,大谷光瑞也进行了充分准备。“五月间第一次移民,近已由大谷氏在日本募集完了。至渔业所需器具,制造罐头之机器具及技师等,大体亦准备就绪。江边工场用地,闻已由伪机关主管人员之手,卖与该移民团云。”^⑥可见,该渔业移民计划比较完整,且已做好充分准备。但由于此时处于日本对东北移民的初期,移民的规模小,人数少,经验亦不丰富,且无渔业移民的先例,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此次渔业移民并未立即实施。

尽管如此,“伪满政府认为欲增加水产之产量,必须诱导优秀渔业劳动者入境;同时日本为完成其大量移民计,亦认为于其‘开拓民’之拓殖计划中,有参入渔业者之必要”^⑦。于是从 1939 年起,日本开始在东北正式进行了“渔业开拓团”的移民。伪满时期东北的“渔业开拓团”(包括海洋渔业渔民)情况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东北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 543 页。

② 何超:《伪“郭后旗水产合作社”概况》,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肇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肇源文史资料》第 1 辑,1988 年,第 62-63 页。

③ 何超:《伪“郭后旗水产合作社”概况》,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肇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肇源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63 页。

④ 何超:《伪“郭后旗水产合作社”概况》,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肇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肇源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63 页。

⑤ 《日人向松花江等处组设渔业移民团》,《东北消息汇刊》1934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⑥ 《日人向松花江等处组设渔业移民团》,《东北消息汇刊》1934 年第 1 期,第 22 页。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 41 页。

详见下表 2^①。可见,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进行了多次渔业移民,但规模不是很大。淡水渔业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问题。日本海洋富饶,淡水渔业生产无法与之相比。而且这种观念在日本深入人心^②。因此日本的渔民主要从事海洋捕鱼,缺乏淡水鱼捕捞经验,来华之后又多以务农为主,渔业为辅,尤其是政府的奖励补助也落实不够等,诸多原因造成此计划并未取得明显成效。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渔业开拓团”对东北渔业资源掠夺的本质。

表 2

所在地	名称	移入年度	备注
镜泊湖	秋田渔农开拓团	民国 28 年	30 户
庄 河	伊方渔农开拓团	民国 29 年	39 户
锦 县	广岛渔农开拓团	民国 30 年	22 户
兴 城	亘利渔农开拓团	民国 30 年	35 户
锦 西	陆奥浦渔农开拓团	民国 31 年	
绥 中	佐渡渔农开拓团	民国 30 年	28 户
虎 头	新泻渔农开拓团	民国 30 年	
密 山	白泡子渔农开拓团		
依 兰	桦太渔农开拓团		29 户
青 云	滋贺渔农开拓团		

(三)会社掠夺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渔业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在华会社尤其是林兼会社来实施的,此外如“日本水产株式会社满洲分社”、“北满淡水鱼会社”等也参与其中。

林兼会社,全称“林兼商店株式会社满洲分社”。该分社于 1928 年 6 月设立,本部设于新京。其营业范围包括:渔具的制造、水产物的养殖及买卖运输、冷藏保存及制冰、船具、渔业用品及处理水产物的用品的制造和买卖等^③,显然这些都和伪满的淡水渔业息息相关。1939 年,它收买了伪兴安北省达赉诺尔湖原有的渔业,设立了独占该湖渔业经营的兴安水产株式会社。此后,又侵入嫩江下游地区,力图垄断这一地区的渔业。为了在这一地区强行推销渔业产品,又设立了龙江水产株式会社,社长为上田金作。在此前后它又在哈尔滨设立滨江水产株式会社(社长林勋)以插手松花江渔业^④。此外,该会社还以黑河为中心,侵入黑龙江干流的鲟鱼渔业生产。可见,林兼会社基本垄断了“北满”渔业的生产。不惟如此,它还引进俄国人的技术,成功地制作罐头进行输出,并插手乌苏里江的鲑鱼生产,开发俄式的盐渍鲑鱼和咸鲑鱼子的研制^⑤。由此可知,林兼会社已涉足到水产品的罐头制造产业,这些都扩大了它的销路。

另据资料显示,该会社 1944 年水产物销售额为:鲜鱼和冷冻鱼 16000 吨,盐干鱼 2000 吨,合计 18000 吨;其旁系会社兴安水产株式会社销售冻鱼 5000 吨,龙江水产株式会社销售冻鱼 4500 吨,合计 9500 吨^⑥。可见林兼会社对东北水产物的销售量还是很大的。林兼会社的产品以军需为优先。“关

①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 41 页。

② [日]中溝新一編:《滿洲年鑑》,滿洲文化協會,昭和 8 年,第 286 页。

③ [日]滿洲國通信社編:《滿洲國現勢》(康德 10 年版),第 564 页。

④ [日]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第 782 页。

⑤ [日]滿洲国史編纂刊行会編:《滿洲国史(各論)》,第 782 页。

⑥ [日]宮下博夫:《大洋漁業と滿洲開發》,滿洲回顧集刊行会編:《あ,滿洲——国つくり産業開発者の手記》,農林出版株式会社,昭和 40 年,第 578 页。

东军所需的军需水产品,是通过日本在满会社林兼商店及日本水产株式会社两个公司所属的分布 30 多处的冷藏库网而进行供应的。”^①可以说,林兼会社是关东军水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为日军提供重要的食物补给。

上述“日本水产株式会社满洲分社”“对‘二界沟水产株式会社’及‘嫩江水产株式会社’通融资金。更在乌苏里江及佳木斯附近,经营渔业,企图扩大其淡水渔业之势力”。^②该社后来合并于“日满渔业株式会社”。“兴安水产株式会社”成立于 1939 年 9 月,资本金为 30 万元。在成立之初,夏季在乌尔顺河和达赖湖捕捞,冬季在达赖湖捕捞,一共三个场所。初期一共有网数 23 个,每网有苦力约 30 人^③。这些会社都积极参与到对东北水产品的掠夺活动中,充当了日本掠夺东北水产业的急先锋,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资源 and 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掠夺,虽然淡水渔业在整个东北的传统产业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但也未能逃脱日本的控制和掠夺,仍然处于日本对华掠夺体系的末端。日本对东北淡水渔业的掠夺反映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几大属性:一是全面性。它表明日本对东北的掠夺是全天候无死角的,它不仅包括工矿业,也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各行各业。二是残酷性。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农民手中的主粮和副食,造成农民的温饱问题难于解决。尤其是在伪满后期,物资全面紧缺,很多民众被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三是险恶性。事实上,淡水渔业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产业,但是在中国东北,尤其是“北满”地区渔业资源丰富,捕鱼业比较繁荣。于是日本对该产业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了适宜其掠夺的水产统制政策,甚至派出一部分“渔业开拓团”进行移民,这说明日本不仅贪图于中国的渔业资源,更准备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殖民,进而将整个东北完全同化于日本,永久吞并中国东北。其准备之充分,用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至 1945 年 8 月日本终于战败投降,其吞并中国东北的妄想终成南柯一梦。

★ 书讯 ★

《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 世纪)》出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杜新豪博士所著的《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 世纪)》于 2018 年 2 月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共计 22 万余字,分导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内容,正文由七章构成。从施肥原理阐述、肥料收集、施肥器具、肥料制作、肥料技术的传播以及施肥技术六个方面勾勒出一幅宋代以降中国传统肥料技术发展和演变的完整图像,同时正文后还附录了明代农书中所载主要作物之施肥方法以及中国古代肥料史年表,以供读者查阅。

本书的主线是探寻士人与农民各自的知识和技术在传统时代的肥料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白馥兰教授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称:“杜新豪的研究足以令人相信,肥料的历史为实践行动和史学阐释提供了一块独特的场域,在其间可以构建出知识协同生产的多种类型与模式”。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各論)》,第 782 页。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 30 页。

③ [日]《满洲国》,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9042180500, 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